

2011-11-30 李薇

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联合召开的“第五次中日关系研讨会”的发言

### 《如何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中日之间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已经作为两国的政治目标确定下来。这个目标昭示了一个共同的愿望，即中日之间希望寻求共同利益。为此中日之间应当承认争议并规避利害冲突，着力发展共同利益。

自从设定战略互惠关系目标以来，中日双方关于如何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在文化和经济方面，双方的合作还令人乐观，但是从外交安全的角度看，“战略互惠关系”似乎距离我们很远。我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障碍。

#### 一、战略互惠关系的障碍之一：缺乏互信

中日之间缺乏相互理解和信任，存在战略猜疑。原因之一是两国间没有完全实现历史和解，日本个别政治家的言行造成负面影响；原因之二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世界格局以及东亚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互之间产生的误解逐步加深。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处在发生巨大变化时期的时候，也是外界最容易对这个国家或者地区产生误解的时候。日本在整个80年代就处在被误解、被猜疑之中，不仅外国人，连日本人自己也热衷于解读自己。而现在的中国也正属于这种情况。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对中国的快速发展都存在“准备不足”的问题。中国还没有为日本客观地了解和理解中

国做好准备，日本也没有为适应快速发展的中国做好准备。就双边关系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又重要的时期。

近代史上日本曾经透过对中国的认识完成对自身的理解和定位，现在，当中国的发展带来地区格局变化的时候，日本再次遇到身份定位的问题。借助对方定位自己，这个特点在日本完成自我定位上比较明显。中国快速发展之时也是最容易产生对中国误判之时。如果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出现偏差，必然影响到日本对自身定位。

去年以来，日本方面有一些行动给出了负面的信号，不仅表明日本对中国的误判，也影响了中国对日本信任。首先，日本的对华外交和军事部署与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同步调整。如 2010 年 12 月 17 日新《防卫计划大纲》和 2011-2015 年《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以及 2011 年发布的防卫白皮书等。其次，日本的外交和军事活动呈现进取性，对华指向明确。如插手南海问题，开展西南诸岛等军事演习，建立防务联盟抗衡中国等。再次，日本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上明确傍美，对华关系失去平衡。如强调“中日关系应建立在美日同盟的平台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是被中国挑起的”、“中国最怕的是美国介入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对抗，而日本的外交出路正是参与美国的这种介入”等，这些观点被认为是“主流”。这些观点不能不引起中方的警惕。

我认为，美日同盟至今仍停留在冷战思维的延长线上且带有强烈的军事特色，而中日之间要建立的战略互惠关系是美日同盟这个平台根本无法对应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所谋求的是挽救正在经历危机的美国霸权和美国利益，即便没有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也会到来，这是美国自身经济依存亚洲

所造成的；日本介入美国的对华遏制行动，即便可以暂时扭转对美外交的被动局面，但从长久看，对日本的国家发展和整个东亚区域一体化没有任何积极的作用。实际上，中国既没有挑战美国霸权的主观愿望也没有客观条件，而美国的兴衰完全取决于美国自己的选择，取决于它是不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因此，日本也需要认真审视。

今年是辛亥革命 100 周年，仔细想来，从孙文到邓小平，代表着百年来中国人共同的一个诉求，就是国家独立民族富强，今天的中国仍旧处在这条延长线上，虽然自身的国力和周边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从发展阶段看，仍旧处在实现工业化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发展目标的角度看，中国 30 年来所做的事情（市场经济体制）与日本没有根本的不同，反映了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潮流。由于中国的整体形成是个历史的产物，外国人要理解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需要比其他任何国家花更多的时间应对外界的怀疑或者误判。

## 二、战略互惠关系的障碍之二：钓鱼岛领土争端

中日之间存在台湾问题、历史认识问题、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等三大敏感为题。其中，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最为尖锐。对于两国来说，正视争议、搁置争端、化解危机是最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事情。

领土争议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承认争议并搁置争议是周恩来、邓小平为处理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主权争议而提出的冷处理智慧。无论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 1972 年，还是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 1978 年，当时的两国领导人不愿意让钓鱼岛争议影响到双边关系的大局，因而能够达成默契。今天，为了避

免钓鱼岛问题影响当前的战略互惠大局，为了最终解决钓鱼岛问题，当务之急是建立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共同危机处理机制。

如果不承认钓鱼岛存在争议以及不搁置争议，中日双方因此而发生冲突的危机就时刻存在。一旦冲突发生，同时还会勾起历史记忆，刺激双方国民感情的恶化，引发民族主义冲动。这个结果对双方长久利益、对地区的安定都没有好处。

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日本的防务政策和对钓鱼岛主权争议的态度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是与日美同盟在冷战后的重新定位同步的。日本的防务自那时起逐步走向海外，日本对“周边”的定义逐渐从隐晦转变为公然，中国的台湾以及周边海域被划为日本的“防务”范围。同时，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公开否认中日双方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搁置争议”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日本外交安全政策的变化是导致钓鱼岛问题升温的主要因素，如果日本方面继续按照否定争议的方针走下去，钓鱼岛必然孕育着更高的危机。

### 三、寻求化解疑虑解决争端的办法

明年是中日恢复邦交 40 周年，我们双方应当合力做些事。具体建议如下：

- 1、回到 1972 年恢复邦交时的原点，就如何坚持中日之间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与时俱进地发展中日关系展开坦率对话。思考那个时代双方领导人的决断及其政治导航的意义；讨论双方 40 年来是否接近或者背离了初衷；探讨在变化的环境中，中日之间应当建立怎样的理性关系。

2、建立两国高层、知识精英之间的双重战略对话机制。建立机制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越是出现危机时越要坚持甚至增加机制内的对话。虽然日本政治领导人的引航难度越来越大，政党影响力明显下降，但这更是对领导人导航责任和能力的考验。

3、承认钓鱼岛主权争议并搁置争议，建立共同危机处理机制。钓鱼岛争端存在一触即发的危机，而且是中日双方共同的危机。搁置钓鱼岛争议是邓小平采取冷处理的智慧。为了让危机降到最低点，当务之急是建立钓鱼岛主权争议的共同危机处理机制，维护中日之间发展战略互惠的大局。

4、扩大双向的青少年之间、文化各领域之间的交流。建议 CCTV 和 NHK 之间增加介绍对方风土人情的电视专题片，报道互访交流的信息，促进相互认知的加深。

5、发挥双方学者在公共外交方面的作用。双方媒体共同邀请资深学者在各方媒体发表对谈或在电视台共同出镜，引导舆论和社会大众理性地认识对方国家。

6、建议媒体之间展开有关“媒体的社会责任”的公开讨论。“媒体是权力社会，权力社会是剧场”。媒体裹挟民众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对政治的理性选择，甚至败坏社会道德。媒体公开讨论自己的社会责任，不仅历练其自身，也把理性带给公众。

总之，中日之间有没有共同的利益？冲突是否大于利益、利益是否大于冲突？答案取决于我们潜心推进哪一方。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这一远大目标的提出，已经给出基本的回答，显示出中日双方的基本意愿。